

## 官渡河上的遥思遐想

谢秀凤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姑姑从信宜怀乡圩镇嫁到本镇中堂大坡村黄华江畔。六七十年代,我们姐弟六人相继出生,常常结伴探望妈妈。那时我们家是超支户,而姑姑家姑父和表兄表姐都是劳动力,不同季节生产队按劳分配到的稻谷、番薯、芋头、玉米、花生、深薯等均比我们家多,为填饱肚子,我们不怕徒步艰辛,赤脚丈量来回二十多里的通往姑姑家的崎岖路途。

从怀乡圩到中堂大坡,下了百步岭后再过官渡河(黄华江)便到了姑姑家。记忆中的官渡河,河水湍急且深,初始没有桥,只有一张竹排(后来又改撑木船)摆渡过往群众,摆渡人是附近生产队领公分的社员,有时渡河如果

遇上生产队收工了,会游泳的人干脆一个猛扎游过来,如果不是汛期,也有人把衣服脱下举过头顶趟水而过的,于我们姐弟,就只有干等着。在千呼万唤,望眼欲穿中上了船后,我们就学着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片段放声高歌“小小竹排江中游,滔滔江水向东流……”那情景,至今想起来也不觉莞尔。官渡河上竹排木船退役后,河面上搭起了一道木板桥,那是十几截每截由两块木板或两根圆木条并在一起连成的,大人们挑着东西过桥平衡力也掌握得很好,可站在他们前后的我们这些小人儿,常常因为大人们踩踏着的桥梁这边陷下去另一边又弹起来而吓得不敢挪步,每每遇到这样的情

况,我们通常是急忙蹲下来然后爬着过桥,生怕一不留神掉下河去,那时那刻,满脑子都是:这里要是有一座石拱桥该多好。

进入千禧年,我们已人到中年,探望姑姑,再也不用乘船,更不用手脚并用爬那抬腿起伏的木板桥了。官渡河上架起了横跨黄华江的铁索桥。此桥一百多米长,约莫一米半宽,桥面铺设着铁板(之前铺木板),桥两侧有铁索作为护栏,就算闭上眼睛在上面蹦蹦跳跳也不用担心会掉到河里了。近年来,随着黄华江虎跳峡景区的开发,铁索桥也成了游客打卡的景点。踏上铁索桥,站在桥中央极目远眺,但见群山如黛,连绵起伏地铺展向天际,轻纱似的云雾绕

绕山腰,将青山染得朦胧而又富有诗意;山脚下,清风徐来时,黄华江宛如一条碧绿的绸带,蜿蜒着漂向远方;汛期水涨,滔滔江水如镀金的彩练与天边的云霞交相辉映,把游人的视线拉得很很长。环视四周,两岸的翠竹与阔叶树葱葱郁郁,层层叠叠的绿意随风中恣意弥散。端视桥头的官渡头船屋,已不再是儿时看到的简陋模样,那青砖黛瓦,飞檐翘角被绿树翠竹拥入怀中,将古朴的韵味与周围的自然景致融为一体,令人流连忘返。

光阴荏苒,时过境迁。伫立铁索桥上,遥忆,遥思,遥祝,紧随乡村振兴的步伐,我们眼里的风景会更美,生活会更加幸福!

## 我的从教历程: 乡村教育的 九年耕耘

陈德文

一九八五年的夏末,十七岁的我攥着一纸调令,骑着自行车,拉着读师范时父亲专门做的小木箱,木箱里装着简单行李和一些书籍,来到了化州市那务镇泉埔小学。眼前是几间黄泥夯筑的校舍,檐角低垂,窗棂疏落,四下里静得只听见风穿过松树林的呜咽,和远处隐约的、固执的鸡鸣。世界很大,大到我刚刚从廉江师范那片规整的方格天地里走出来;世界又很小,小到一下子被这四四面青山合围,只剩下手里一卷教科书,和一颗被“教导主任”这个称谓压得微微发烫,却又鼓胀着莫名热气的决心。

最初的时日,是与“简陋”这个词亦诚相对的。教室是祠堂改成的,多数都是泥砖房,窗户没有玻璃,蒙着旧化肥袋。黑板是涂了墨汁的杉木板,粉笔落下,簌簌地掉着木屑;课桌高矮参差,映着孩子们高低参差的个头。教学,便是在这物质的贫瘠里,开凿精神的泉眼。然而,教学之外,还有另一重更广阔的、沉甸甸的课堂在夜幕下展开——“扫盲”。农忙后的夜晚,村中的公屋里,一盏煤油灯拢住一圈黝黑而疲倦的面孔。他们多是壮年,手指粗粝,握笔如握锄,额上沁着汗,眼中却有一种近乎羞怯的、陌生的光亮。当“人口手”、“日月火”这些最简单的字形,笨拙地从他们笔下诞生时,那低低的、不确定的念诵声,汇成一股暖流,冲淡了夜的寒与日子的苦。我恍然明白,我所点亮的,不止是孩童启蒙的晨曦,更是一个村庄试图挣脱混沌暮色的、最早的决心。

两年后,我调至那务镇中心小学,任少先大队的总辅导员。红领巾在胸前飘成一片火热的云,歌声与鼓掌声终于让校园的底色明亮起来。我成了“孩子王”,被孩子们尊称为“陈老总”,每个学期领着一群羽翼未丰的雏鸟,开展春游、野炊、长征、登山……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他们认识山外的星辰,丈量脚下的泥土。后来,我又转任教导主任,负责普及教育和教学工作,教育教学,至此不再仅是知识的传递。它是春日山坡上的辨认草木,是夏夜操场里讲述的银河故事,是为一个自卑的留守儿童特意设计的、能让他挺起胸膛的“职务”,是耐心地、一遍遍矫正那带着浓重乡音却无比认真的朗读。乐趣,便在这琐碎的、日复一日的耕耘里,泉水般涌出。当你发现那些曾被大山沉默困住的小心灵,开始学会用语言和文字,笨拙而热烈地表达一朵云、对一次日落的惊奇时,那种充盈的喜悦,是任何物质的酬报都无法比拟的。

九年,青山寂寂,人世熙攘。我把生命中最饱满的九年,酿成了化州山间一阵润物无声的细雨。一九九三年,当“广东省南粤教书育人优秀教师”的证书与化州市人民政府的三等功奖章递到手中时,它们压手的份量,并非来自荣誉本身,而像是那九年光阴所有晨昏、所有目光凝成的琥珀。奖章无声,却仿佛回荡着泉埔小学夜课时的读书声,回荡着全镇小鼓号队嘹亮的行进曲,回荡着无数个深夜,我批改作业时笔尖的沙沙声,与窗外山风应和的寂寥与丰盈。

如今回首,那九年何尝只是一段职业的起点?那是我精神的故乡。它教会我最质朴的真理:教育,尤其是植根于泥土的教育,其光芒不在于塑造惊天动地的伟业,而在于守护每一株幼苗不被湮没的尊严,在于点燃每一个平凡灵魂深处那簇渴求光热的火种。那简陋校舍里摇曳的灯火,与今日窗明几净的学堂华光,本质并无二致,都是文明得以不坠的、最坚韧的索引。

岁月奔流,或许我已走出那片具体的山水,但山间灯火,早已内化为我生命不移的坐标。它时时提醒我,无论身处何地,面对何人,都要怀揣那份最初的、十七岁时的赤诚——做一盏灯,哪怕微光如豆,也要固执地,温柔地,照亮一寸寸可能的黑暗,温暖一方方待垦的心田。那光,始于化州的山坳,却愿它,能无声地,照得更远一些。

从战乱纷飞的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如今的繁荣昌盛,她经历了太多的风雨,也见证了太多的奇迹。她常常感叹自己没想到能过上好日子,没想到能天天有肉吃,这份简单的满足,让我无比心疼。然而她也是幸运的,用外公的话讲,她是一个很有福气的“方酋”。

外公和外婆相濡以沫七八十年,这份感情早已融入彼此的血液。外婆离开那天,外公哭得很伤心。我知道,他是在思念那个陪了他一辈子的人。那些年,他们一起在田埂上劳作,一起在灯下缝补,一起把苦涩的日子过出甜蜜的滋味。如今,只剩他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屋子,守着那些共同的回忆。

外婆身下的十八个外孙,如今都已长大成人,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我们散布在各个城市,为了生活奔波忙碌。可每当提起外婆,每个人的脸上都会露出温暖的笑容,都会想起那个在老屋里为我们做饭、缝补的老太太。外婆的爱,就像春雨般润物无声,滋养着我们成长,成为我辈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

火化证明上的名字渐渐模糊,可外婆的身影却越来越清晰。她站在巷口,穿着布衫,脸上带着慈祥的笑容,向我挥手。她的手很粗糙,却很温暖;她的话语很朴实,却充满力量。我知道,外婆并没有真正离开,她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伴在我身边。她的爱,她的坚韧,她的善良,会永远刻在我们后辈的心里,代代相传。出殡那天,我送外婆再次经过汤竹岭的田埂上,哪里的路边还能看到狗尾草。我又想起了青青河边草……外婆就安葬在汤竹岭脚,坟头旁边长满了狗尾草。

织女星落,香火长存。外婆,愿你在另一个世界里,能与父母重逢,能与弟弟相聚,能再做回那个无忧无虑的织女。愿那里没有战乱,没有贫困,没有委屈,只有幸福与安宁。而我们,会带着你的爱与期望,好好生活。你的故事,我们会讲给下一代听,让他们知道,曾经有这样一位伟大的女性,用她的一生,诠释了爱与坚韧的意义。

## 想起在工厂倒班的日子

梁瑜智

马年新春,一日午后,突然想起在工厂倒班的日子。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某天,我以“知青工”的身份走进市某化工厂。工厂普钙车间的分析化验岗,成了我工作的第一站。那段“三班倒”的日子,整整两年零三个月,如今想起,恍如昨天。

父亲临近退休,车间主任是他当年的学徒,借着这份情,我成了旁人眼里的“幸运儿”。因为除了坐办公室“抄抄写写”,这份工算最轻松的。

然而并非如此。车间窗洞洞开,冬夜的风寒冷刺骨,刮在脸上像刀子割,手指冻得僵硬,还要捏玻璃试管摇晃;夏天的车间更难熬,刚从传送带输送出来的磷肥热气腾腾,混着氨氮气的刺鼻气味,就算裹紧纱布口罩,那股味道还是往鼻腔里钻,熏得人头晕胸闷……

最难忍的,是清理“化成室”的日子。那个密闭的大铁滚轮仓,顽固的磷肥渣死死粘在仓壁上,得用工具一点点抠,强力牛角风扇劲吹,气味依然呛得

人直掉泪,多待一秒都难以坚持。轮岗时间一到赶紧钻出来换第二批人进去。每次清理完,走出“化成室”的那一刻,如逃出生天。那些日子,苦是真的苦,累也是真的累。

好在,苦中有乐。车间的工友们,累了就互相搭把手,苦了就说几句笑话。工友情深,让难熬的班次多了几分温情。我总爱在休息时,去借阅图书室的,不能让青春困在重复的劳作里,要给自己一个更长远的未来。

高考志愿填报的“不服从分配”让我远离大学校门,于是我开始了中山大学中文专业的自考。《吕梁英雄传》《巴黎圣母院》等中外名著看得津津有味,“三班倒”的节奏打乱不了我的坚持。我顺利通过了考试,不久,我走进了新闻单位。此后,我始终坚持学习,继续参加中大本科自考,本科毕业后才感觉没有太落后于身边人。

如今回望,特别感恩在化工厂倒班的日子,让我在往后的人生里,始终有底气,有方向,永葆初心。

## 茂名印记

##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高潮。这时从广州、汕头、湛江、高州、化州、梅县等城市的知识青年汇集到了穷乡僻野的化州红峰农场。他们大多只有十七八岁,最大的也只二十多岁,远离了亲人,远离了熟悉的闹市,远离了舒适的城市生活。但他们毫无怨言,更没有愁眉苦脸,而是豪情满怀,壮志凌云,以笑脸迎接困难。照片为当年化州红峰农场三队的知青们和农场工人们并肩劳作、艰苦奋斗的画面。当年他们喊出的口号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用双手搬石块,用锄头挖硬土,硬是用汗水和意志,筑起了一条条如腰带环山的林带,让胶树在良好的水土保持中茁壮成长,把昔日的乱山岗打造成了胶林成片、绿树成荫的理想橡胶园。

文字/陈冲 照片提供/化州红峰农场

## 忆外婆

姚超猛

“青青河边草,悠悠天不老,野火烧不尽,风雨吹不倒……”小时候经常听大队广播的喇叭播放这首歌。那时外婆拉着我的小手走在汤竹岭的田埂上,只记得田埂上很多狗尾草,我一边走一边淘气地拨弄着它。

直到火化证明上那个陌生的名字,像一枚生锈的针,猝不及防刺进我39岁的心房——梁秀芳。可在此之前的三十多载的光阴里,我只知道她是外婆,是那个总在高州镇金山园老屋里系着围裙,把灶台擦得锃亮,把外孙们的衣角缝得整整齐齐的老太太。直到铅灰色的纸张上印着“姓名:梁秀芳”,我才惊觉,这个陪了我几十年的老人,我竟从未真正知晓她的来处甚至不知其姓名。九十三年前的岁月,她像村口那棵老榕树,沉默地扎根在时代的泥土里,枝繁叶茂庇佑着她所有的子孙后代,却从未有人追问过她最初的年轮。也鲜有人知道外婆的童年以及她的所有经历。

农历七月初七,是外婆的生辰,也是传说中织女与牛郎鹊桥相会的日子。1932年的这一天,阳江白沙镇南安岭小村落里,一对普通夫妇迎来了他们的女儿,望着夜空中隐约的银河,便给她取名“织女”。那时的他们或许不曾想到,这个寄寓着美好期许的名字,终究没能让女儿拥有安稳团圆之家。六年之后,1938年的炮火撕裂了岭南的宁静,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碎了阳江的炊烟,也踏碎了一个六岁女童的童年。父母的怀抱还残留着温热,却不得不狠下心编造一个善意的谎言,让她跟着素不相识的陌生人逃难。“去高州,那里有番薯食,我们随后就来。”这是父母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却成了跨越半生的骗局。她攥着母亲塞给她的半块糙米饼,在颠簸的路上频频回头,直到熟悉的村落与父母的身影彻底消失在烟尘中。而她的弟弟,那个比她小几岁的男孩,也被送往另一户人家寄养,从此,血脉相连的姐弟,成了彼此生命里模糊的影子,再未相见。

高州石鼓镇大自堂梁氏,成了织女的新归宿。或许是觉得“织女”太过浪漫,与寄人篱下的身份不符,或许是想让她彻底

融入新的生活,新家给她改了名——梁秀芳。这个带着时代印记的名字,朴素、温婉,却也藏着一丝身不由己的顺从。她不再是那个可以在父母膝下撒娇的织女,而是要学着洗衣、做饭、放牛、喂猪……的梁秀芳。寄人篱下的日子,教会她忍耐。小小的身躯里,装着对父母的思念,装着对未知的恐惧,却只能用沉默包裹自己,在深夜里偷偷抹泪。那些年的苦难,她从末对我们提起,或许早已被岁月磨平了棱角,或许只是觉得不值一提。我也是在不经意中打听到外婆这些过往。可我总能在她晚年凝视远方的眼神里,看到一丝难以言说的怅惘。而且她生前三番四次叫我带她回阳江看看她的出生地。

十几岁的梁秀芳,落得清秀温婉,后来经人介绍认识并嫁给了外公。外公是公职人员,有着“米部”的铁饭碗,在那个年代,已是旁人羡慕的姻缘。可外婆的苦,才刚刚开始。婚后的日子,被柴米油盐与生育的重担填满。她怀过很多孩子,那些尚未成形的生命,有的没能熬过缺血少药的年代,有的没能抵过贫困的折磨,最终活下来的,只有一个儿子和五个女儿。在重男轻女的风气盛行的乡村,这样的家庭结构,让外婆成了邻里闲言碎语攻击的对象。可她从未与人争执,只是把所有的委屈咽进肚子里,默默地操持家务,照顾孩子,支持外公的工作。外婆也从未有抛弃女儿的做法。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丢弃女儿是很常见的现象。

外公待外婆极好,这份好,是那个年代最珍贵的温暖。外公在卫生院忙了一天,下班回来顾不上休息,还要赶着大水牛去犁田耙田,只为让人家能吃多一口粮食。外婆则会提前把饭菜热好,在田埂边等着他,夕阳把两人的身影拉得很长,构成一

幅最朴素的田园画卷。他们一起走过了七八十年,几乎从未红过脸。我小时候常听母亲说,外公也有脾气,可只要外婆一开口,他就会慢慢平静下来;外婆胆子小,遇到事情总是先看外公,而外公总能给她满满的安全感。这份相濡以沫的感情,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却在日复一日的相守中,沉淀成最动人的风景。那些年,日子过得清贫,一件衣服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三老四接着穿;饭菜里难得见到荤腥,只有逢年过节,单位分猪肉时才能闻到肉香。可外婆总能把日子打理得井井有条,她会吧黄槐做成粥饭可用的菜肴,把粗布衣服缝补得整整齐齐,让家里始终透着一股干净整洁的气息。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外公的医术也渐渐有了名气。到了1998年左右,他已经成了镇上有名的赤脚医生,不少邻居的人都慕名而来。家里的生活水平也渐渐提高,外婆终于不用再为温饱发愁,他们在镇上买了地皮,盖起了新房子。那是一栋两层的小楼,外墙贴着洁白的瓷砖,屋里铺着光滑的瓷片。搬进新房子的那天,外婆站在院子里,看着崭新的房屋,眼圈红了。一遍遍地感叹:“没想到啊,这辈子还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还能天天有肉吃。”那时的我,才十几岁,听不懂她话语里的沧桑与感慨,只觉得外婆的笑容格外灿烂。如今想来,那些看似平常的幸福,是她用一辈子的辛劳换来的。从寄人篱下的孤女,到拉扯六个孩子长大的母亲,再到安享晚年,外婆,她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却始终对生活抱有最朴素的期许。

后来儿女们陆续成家,外婆并没有停下忙碌的脚步。她又开始忙着照顾外孙和孙子,这一忙,又是几十年。外婆身下有十八个外孙,我是其中之一,不过我不是最受

宠的那个。小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探外婆”。每逢周末或假期,我都会缠着父母带我去金山园。刚到猪肠坑,我就能看到外婆站在门口张望的身影。她总是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布衫,头发用花生油梳得整整齐齐,见到我们,脸上立刻堆满笑容,快步上前,接过我们手里的东西,拉着我的手往屋里走。外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招待我们。外婆会坐在我身边,一边给我剥橘子,一边问我学习怎么样。她的手很粗糙,布满了老茧,那是岁月和劳作留下的痕迹,可握着我的时候,却格外温暖。

可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业的压力,工作的忙碌,家庭的责任,让我探外婆次数越来越少。直到最初的每个月一次,到后来的半年一次,再到一年一次。我不再像小时候那样,盼着去探外婆,也是因为工作繁重、琐事缠身而找借口推脱。

如今,我也快四十岁了,鬓角已经有了很多白发,孩子也到了我当年探外婆的年纪。可我再也没有了小时候那种迫切的冲动,再也看不到村口那个翘首以盼的身影。直到外婆离世,直到拿到那张火化证明,我才知道她的原名叫梁秀芳,才知道那个陪伴了我四十载的老人,有着这样一段平凡又不平凡的过往。我深感惭愧,惭愧自己从未好好倾听她的故事,惭愧自己从未真正了解过她,惭愧自己在她晚年没能多陪陪她。

外婆的一生,是中国无数传统妇女的缩影。她们默默无闻,辛苦劳作一生,把自己的青春、爱情、亲情都奉献给了家庭,却很少为自己活过。她们经历了战乱、贫困、重男轻女的压迫,却始终保持着坚韧、善良与乐观。外婆的名字从织女变成梁秀芳,从一个寄人篱下的孤女变成一个儿孙满堂的老人,她的人生轨迹,见证了时代的变